

大连理工大学政治理论学习 参考资料

(2018年第7期)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

2018年4月24日

准确研判当前国内社会思潮

【调查报告】

- 当前国内社会思潮趋势走向 (2)

【重点解读】

- 董振华: 2017 民粹主义透视 (11)
- 张彦: 民族主义思潮的理性与非理性 (19)
- 胡近: 是什么激化了民族主义情绪 (25)
- 张云飞: 2017 年度生态主义的“三种色调” (28)
- 张旭: 警惕消费主义消解社会发展根基 (34)
- 陈昌凤: 泛娱乐主义思潮的政治隐患 (40)
- 师曾志: 警惕泛娱乐化奴役自我 (44)
- 周少来: “激进左派”渐成中国学术界“公害” (46)
- 陈继红: 在徘徊中前进的文化保守主义 (52)
- 黄楚新: 严防历史虚无主义解构主流意识形态 (57)
- 陈槽: 新自由主义走“下坡路”了吗 (63)
- 范逢春: 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的逻辑谬误 (67)
- 项久雨: 看清“普世价值”的伪善本质 (71)

【调查报告】

当前国内社会思潮趋势走向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2017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围绕经济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不同矛盾，各种思潮交织激荡。近期，人民论坛开展多轮公众问卷调查，组织200余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讨，对1200余位党政干部、企业家、青年学生等重点群体开展深入访谈，并参考近十余年来社会思潮演变趋势和国内外理论界研究成果，综合筛选出2017年国内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潮，它们分别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生态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激进左派、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

党的十九大召开是2017年中国政治领域的重大事件，也是思想领域凝心聚力的大事。总体来看，十九大召开前，十八大以来各领域发展成就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赢得了广泛认可，国内社会思潮呈平稳态势，与往届党代会前“左”“右”各派思潮激烈交锋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十九大召开后，全党全国人民掀起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角、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愿景，都让国人深受鼓舞，大家统一认识、凝聚共识，进一步坚定了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十八大之前，主流意识形态这个“一”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多”并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竞争态势；经过五年的努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凝聚力显著增强。其他思潮或偃旗息鼓，或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国内舆论呈现出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生动局面。

信息时代扩大和加快了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面和速度，使得多元社会思潮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不断加深。看清思潮背后的演变逻辑和发展规律，做好思潮风险研判，对于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7 年国内社会思潮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表 1 2017 年国内社会思潮

思潮名称	关注指数	影响指数
民粹主义	★★★★★	★★★★★
民族主义	★★★★☆	★★★★★
生态主义	★★★★☆	★★★★
消费主义	★★★★☆	★★★★
泛娱乐主义	★★★★	★★★☆☆
激进左派	★★★☆☆	★★★☆☆
文化保守主义	★★★	★★★
历史虚无主义	★★★	★★★
新自由主义	★★☆	★★
普世价值论	★★	★★

民粹主义持续滋长，体现出与其他社会思潮较强的合流之势。当前，民粹主义已经在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而在我国，民粹主义也有新的发展动向。有专家指出，随着全球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虚拟、便捷、去中心化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空间消解了民粹主义的传播限制，使民粹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更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特征。在我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

各类舆情事件中，同时体现出与其他社会思潮较强的合流之势。其中有几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一是一些人假借爱国主义之名，行非理性之实。例如一些人针对韩国部署“萨德”一事盲目抵制韩国的行为，展现出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的倾向。二是网络民粹的盛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往往以网络谣言的形式煽动公共情绪，制造舆情事件，将事件推向极端，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推向负面。如2017年北京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被一些人解读为“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在一些网络谣言和虚假图片的推波助澜之下不断发酵，导致一些民众对政府的负面情绪增加。三是为资本逻辑所驱使，将民粹主义特别是网络民粹主义转化为获取利润的工具。如2017年影响较大的“江歌案”，就被不少自媒体公众号利用，成为网络流量的“收割工具”。

民族主义更显正能量，国人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与世界，大国心态更加彰显。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正在被逐步打破而日渐趋向中西均衡。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民族主义思潮正能量有所增加。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深得人心，中国民众对外部世界的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开始主动关注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能够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以相对理性、客观的心态看待和分析主权安全问题。其中虽仍不免伴随一些杂音，但整体趋于克制、平和，大国心态更加彰显。另一方面，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更加明显，国人正在以一种自豪的态度看待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成就，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创造日益成为民众共识。

生态主义在全球面临转折点，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虽然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议》动摇了全球气候合作

的基础，对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种种努力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使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念更加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不仅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也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指出了新方向。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推动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同时，中国也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用先进的理念和积极的行动诠释全球可持续发展观，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许和认可，逐渐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信息时代下消费主义蔓延之势迅速，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良性互动逐渐缺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消费主义思潮在我国迅速蔓延。当前，“网购”已经成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双11购物狂欢节”也成为一种几乎得到全民参与的独特文化现象。虽然促进消费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过度消费无疑会引发消费的异化，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冲击。例如当前，炫耀自身消费水平成为一些人满足虚荣心理的方式，以多挣钱、多消费、多享受为特征的畸形消费文化正在对广大民众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让不少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不可忽视的是，当前的非理性消费、透支消费、奢侈性消费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并逐渐在消费者的认知中与身份、地位等方面挂钩，带有了“等级”“特权”的色彩，反映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良性互动逐渐缺乏。

泛娱乐主义在国内愈演愈烈，情绪化、非理性特征日益显著。“泛娱乐化”是娱乐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当前，泛娱乐主义思潮在我国消费、传媒、教育、信仰、政治等多个领域均得到了集中体现。值得注

意的是，泛娱乐主义思潮的影响范围正在加速扩大，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发展，但也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挑战与冲击。在资本驱动和文化消费的刺激下，“娱乐”的功能被过度放大，进而不断超越其应有的边界而向严肃领域渗透。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娱乐类信息常常进入热搜榜，而民生、政治类信息逐渐有边缘化趋势，关注度相对较低。在这股浪潮的侵袭下，公众对明星隐私的关注、对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的恶搞、对严肃事件的情绪化跟风评论，将会使其逐步丧失理性批判的能力，陷入全民狂欢的假象中。

当前社会思潮发展的风险点

公共事件更易被民粹主义利用，从而激化社会矛盾，扰乱社会秩序。民粹主义以反对权威、反对精英、反对政府为主要特征，企图左右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民粹主义者利用公众事件大肆宣扬、散播反政府言论，企图搅乱社会秩序、动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往往利用公共事件进行炒作，甚至制造谣言误导民众，从而激化社会大众的非理性意识，催生负面社会情绪。特别是当中等收入群体和较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时，公共事件的爆发会激发他们的愤怒情绪，将其关注点引至问题的负面，很可能导致其过激行为。如有不少青年学生就“北京疏散人口”这一话题进行了抨击，提出“政治中心难道不需要人文关怀”等质疑；针对“红黄蓝”事件，有些人质疑“社会的公正性是否是建立在特殊条件之上的”，诸如此类的观点均展现出民粹主义思想的强大蛊惑能力。

重大时间节点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激进左派等思潮再起波澜。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激进左派等思潮一直是我国社会中较为活跃的思潮，它们看似“价值中立”，实则以虚构或解构中国历史、否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等为目的，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仅如此，历史虚无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以

及激进左派等，往往倾向于在重大时间节点炮制舆论话题，借助新媒体传播负面言论。2017年恰逢我国多个重要历史节点，一些人借机制造事端，混淆公众视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8年，我国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这样的时间点或将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以及激进左派炮制舆论的最新目标和一手材料。我们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激进左派等思潮相互裹挟，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侵蚀人民群众的思想认知。

互联网平台为不良社会思潮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易成为其操控舆论的工具。随着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不断加快，普及范围持续扩大，绝大部分民众所得到的信息和知识内容基本都来源于互联网。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以及更新快等特点，也为一些不良社会思潮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滋生土壤。如网络民粹、泛娱乐主义思潮等，非常容易借助网络进行造势，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由于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真假难分，对辨识能力较弱的人群，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极易产生不良影响。不良社会思潮利用互联网快速传播的特点，大肆宣扬自身观点，企图破坏、瓦解主流意识形态。目前，我国现有的监管机制对于有效约束不良信息尚不能达到最佳效果，网络舆情治理难度依然较大。在此情况下，网络平台很容易成为不良社会思潮把控乃至操纵舆论的工具。

青少年、底层公众等群体极易成为不良社会思潮传播的突破口。不良社会思潮往往容易针对缺乏组织、缺乏判断能力、易产生激愤情绪的群体进行思想传播，青少年、底层公众等群体都是不良社会思潮的易感人群。对于正处于认知形成过程中的青少年而言，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相对较弱，容易受到不良思潮的影响和蛊惑，产生偏激、愤怒、不满的情绪。此外，一些泛娱乐化的综艺节目和网络视频助推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文化虚无、历史虚无等思潮，均易对青

少年的认知产生误导。对于底层公众而言，民粹主义、激进左派等社会思潮尤其具有煽动性。如 2017 年网上流传“三端”人群（高端人群、中端人群和低端人群）的说法，煽动底层公众将矛头直指政府。由于一些底层公众在话语权方面存在缺失感、失落感，因而对社会问题和不公平现象比较敏感，一旦受到煽动，便会不加辨别、不假思索地加入抨击社会的队伍，为不良思潮的发展推波助澜。

有效应对社会思潮风险的对策建议

积极化解非理性言论，提高民众主动抵御负面社会思潮侵袭的能力。社会的发展需要来自各方的声音，面对多元思潮并存的现状，我们应秉持尊重差异性、包容多样化的原则，认真倾听、充分尊重民众的合理意见，给予民众相对充分的表达空间。对于非理性言论，我们不应一味消极回避，而是应积极化解矛盾、澄清事实，对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给予及时、科学的阐释。面对民众诉求和社会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进行宽泛、宏大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而应更多着眼于实际，正视并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些错误思潮之所以能在民众中产生影响、不断发酵，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些民众在思想建设上存在薄弱环节，给负面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特别是一些幕后推手致使事件趋于复杂。这些幕后推手有的是出于经济利益诉求，有的是出于政治利益诉求，不排除有境内外势力勾结造谣、故意抹黑党和政府形象的可能性。为了避免热点事件引发意识形态风险，相关部门应当妥善处理百姓比较关注的教育、医疗、社会不公等问题，通过公开关键事实、回应公众关切，抵消负面舆论的影响，严厉打击故意传播谣言、挑拨是非的不法分子。此外，我们需不断加强思想意识形态建设，培养民众辩证理性的思维能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使其具备主动抵御负面社会思潮侵袭的能力，避免陷入错误思潮的陷阱。

倡导理性爱国，防止极端民族主义和盲目自大的倾向。2017年，随着中国实力逐步增强，国内盲目自信、盲目排外、自高自大的思想倾向和情绪有所蔓延。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不仅会加剧国家地区之间的民间对立，有时还会绑架外交策略，对国家间博弈造成形势误判等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警惕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狭隘民族主义，防止过高的乐观主义和民族优越感带来的“捧杀”；另一方面要保持理性，加强舆情研判，避免极端网络民族主义抬头，积极化解种种非理性的言论和行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政府应引导民众树立理性自信、不卑不亢的大国心态，强化忧患意识，力避举国狂热，力保举国清醒；规范媒体发声，对于鼓吹民族主义、误导民众、哗众取宠、一味吸引眼球的各类媒体，要视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理。政府在鼓励民众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也要倡导文明出游，遵守当地的规则和风俗习惯，避免因个别游客不文明、不理性的行为而抹黑中国形象。

加强重要时间节点前后的思潮监测、预判和应对工作。面对负面社会思潮的侵扰，相关部门应主动亮剑、正面回应，增强主动性和引导力，特别是对于重要时间节点前后，各大媒体应主动加强监管，做好舆情监测，及时排除可能对民众产生误导或导致重大舆情事件的隐性危机。在此前后，各大媒体也应有针对性地向民众普及相关知识，增强其判断能力。各级网信部门要提前部署，加大监管力度，全面加强对网络思潮言论的跟踪监测和动态管控，提升对社会思潮的实时监测能力。此外，还应加强网信部门、政府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部门的合作沟通，面对可能出现的舆情事件，各部门之间应建立快速联动的反应机制，第一时间进行准确判断，进行风险评估，及时表明立场，避免煽动性言论的传播扩散。

处理好思想层面“统一”和“多元”的矛盾。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与“多元”，是国内外同时存在的一对矛盾。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巩固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当前，受政治极化、民粹化所困扰的西方国家媒体民众，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表示担忧。在国内，主流意识形态逐步占领了思想高地，影响力得以扩大，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转入地下，形成潜在隐患。例如一些人通过网络平台对“核心意识”提出非议，认为这是压制民主、思想控制的表现。面对国内外思想层面出现的种种变化，我们要密切关注、未雨绸缪。既要确保“多元”基础上的“统一”，又要保证“统一”主导下的“多元”，正确处理好思想层面存在的矛盾，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表2 人民论坛 2010—2016 年度社会思潮评选结果

排序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1	新自由主义	普世价值论	民族主义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2	民族主义	新自由主义	创新马克思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	民族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	新权威主义
3	社会民主主义	创新马克思主义	新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	新左派	新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
4	文化保守主义	道德相对主义	拜物主义	创新马克思主义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	极端主义
5	道德相对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普世价值论	普世价值论	普世价值论	新左派	新自由主义
6	新左派	文化保守主义	极端主义	宪政思潮	生态主义	普世价值论	虚无主义
7	历史虚无主义	新国家干预主义	新儒家	民粹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	新儒家	新左派思潮
8	功利主义	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新左派	极端主义	生态主义	功利主义
9	大国心态	民粹主义	道德相对主义	新儒家	新儒家	极端主义	消费主义
10	伪科学	公平正义	社会民主主义	伪科学	宪政思潮	道德相对主义	生态主义

【重点解读】

2017 民粹主义透视

董振华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社会思潮，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影响越来越广泛。但是，人们对与民粹主义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一般认为，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相对立，多是以维护平民尊严与利益为由，反对权威、反对精英、反对政府，甚至有时以民意为砝码，企图左右或者阻碍政府的决策与行动。实际上，民粹主义是一种西式“民主”的极端化。民粹主义的历史几乎和民主的历史一样悠久。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伴随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当代中国民粹主义开始滋长，并以各种方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对此，我们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和全面的分析，在公共决策中对于民众的合理意见充分吸收和尊重，同时避免民粹主义泛滥影响国家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中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形态

民粹主义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形成一种很有影响的力量，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它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和警惕民粹主义的泛滥问题。2017 年度，中国的民粹主义的表现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合流趋势越来越明显，往往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由于对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深刻记忆以及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广大民众对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越来越具有高度的认同感，爱国主义成为了凝聚民族力量的一个积极因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盲目排外的现象。他们以非理性和

情绪化的方式对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正常的经济社会交往活动予以抵制和排斥，对我国外交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民粹主义和网络文化结合，表现为网络暴力主义。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微博、微信、博客等平台上时政事件的传播、舆论的聚集过程体现了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但这些平台不容易凝聚成理性的社会共识，有时会向极端的方向发酵。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总体上传播的是社会主流价值观。但是，有些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人认为，这些媒体的公信力值得质疑，认为他们是为社会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代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这些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社会群体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表达对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城乡对立、环境恶化等问题的不满，以情绪化、攻击性的语言对制度缺陷、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进行攻击和情绪煽动，表现为网络暴力主义。

第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结合，表现为暴民政治。由于政治参与权的缺失感、经济层面的被剥夺感、“阶层固化”的失落感，一部分人将压抑在心底不满的情绪放大和释放，往往表现为反政府、反精英，而过渡到暴民政治。国家不断开放，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更加强烈，迫切地想参与国家治理，以证明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西式民主价值观的输出，别有用心者鼓吹一人一票才是“真民主”，令广大人民群众自嘲“被代表”的现象层出不穷。经济腾飞拉开了收入差距，市场经济加剧了资本的力量，普通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不及拥有丰厚资本的企业家或者其它精英群体。社会在经济层面与精神层面上都产生了裂隙。以经济能力为基础，有人提出了“阶层固化”一说，这种理论迅速在互联网上蔓延，“寒门难出贵子”的言论喧嚣尘上。民粹主义思潮对于党政机关和政府部门发布的各类法令、政策、规章以及执行的方式方法十分关注，往往是借助具体的

利益诉求，在热点议题和社会情绪推动下反复发酵，如果他们的利益受损或者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就很容易引发激烈情绪。例如，各地建立垃圾焚烧场的举措几乎无一例外都遭到当地群众抵制。一些人信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处理方式。

第四，民粹主义和虚无主义结合，表现为否定党的历史和路线方针政策。例如，有人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官员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以貌似追求公正、平等的民粹主义为幌子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这都是虚无主义利用民粹主义在借尸还魂。

第五，民粹主义和商业目的融合，表现为资本牟利的工具。资本本性就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一些人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把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营销策略和“吸粉”手段，借助微博、微信的信息分发的重要渠道，推广商业平台、进行广告营销，攫取名利。从而使得民粹主义为商业利益所利用，制造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因素。

民粹主义滋生的社会基础和现实条件

民粹主义在中国的滋生和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以及现实条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互联网为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互联网成了民粹主义的主要舞台，网络热点通常都有民粹主义如影随形。民粹主义现象与言论层出不穷，旗帜鲜明的民粹主义者却在少数。

网络世界像一个人多口杂的江湖，“言论自由”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微博、微信（公众号）每天产生数以亿计的信息流，自媒体为吸引流量会追寻热点进行内容创作，发表自己的见解，试图从同一个热点的不同层面挖掘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其中不乏能够激励或者鞭策个人、社会向好的言论，然而总体来看，这些内容有多少经过了对事件的多方严谨考证，撰文者本身是否了解实情全貌，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都知道现在什么标题能让一篇文章从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变得瞩目——“政府”“国家”“军人”“专家”“教授”“留学生”等这些标签，能够更快的引起关注，更多的引起共鸣。然而，这样的标签下，人们所执意追寻的“真相”是事情的本来面目，还是埋藏在自己内心、早已设定好的答案？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平台，基本消除了公民发表言论的成本，在这里发言不必经过深思熟虑，也更容易受他人影响。就像“毒鸡汤”也照样能够引发大量转发与共鸣一样，转发这一功能让一篇文章能够以几何倍速扩散，然而人们的转发动机几乎是源于一种感觉——“说的有道理”。那么这种“道理”是真是假，是对是错，没有多少人会小心求证，或者说相当一部分网民缺乏这种理性的鉴别能力，很多转发几乎是不假思索的。网络大事件在借助舆论疯狂发酵之后频频发生颠覆式的反转就是最好的佐证。发言的无序性与社交平台传播特点一道，增加了互联网言论监管的难度。两相结合不难发现，互联网上民粹主义言论的产生与扩散，很大程度上是网民无意为之的。而恰巧是这种无意为之，又让大部分网民逐渐对这种思维方式习以为常。这就在人们心里埋下了民粹主义思维方式的种子，每个置身其中的网民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成了这个负面效应的传播者，成为民粹主义吞噬理性民主的帮凶。

第二，对立心理是民粹主义滋生的内在精神因素。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发展起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平民与政府、精英之间

心理上的对立。找到这种对立产生的根源，能够为消除这种隐形对立指明道路，进而帮助消解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认识世界时会受到自身已有认识的影响。因此，思维方式一旦形成，人们在面对现实事件时会不自觉按照以往的思路去分析。2017年，网络上曝光了数所幼儿园虐童事件，其中反响最大，引起关注最多的有两件——“上海携程”、“北京红黄蓝”。其它报道里，孩子们遭受到的伤害同样让人心痛，为什么没有引起这么大范围的讨论呢？因为捆绑名企，让它们成了“出头鸟”。人们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是抱有强烈的好奇心，而这种远离“平民百姓”生活的标签，不论是事实还是虚构，总能第一时间引起他们的兴趣，并且迅速激发同理心。这种同理心是建立在将国家与政府视作一个抽象的概念，将精英群体视作一个抽象的整体，并且将自身所在的群体与之对立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这种潜意识中的对立一旦形成，官媒的所有解释似乎都成了掩饰，而抨击政府、抨击精英的那些内容创作者，仿佛就成了揭开面纱看清真相的智者——围观者这么认为，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这其中还存在一个原因：具体的个人与抽象的整体概念是不同的，官媒、政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性整体，而网络上的内容创作者大都是以理性的个人形象出现的，这也能够说明为何即便有亲人朋友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属于所谓“精英阶层”，也并不影响这种对立，因为将一个具体的人从抽象概念中剥离出来以后，他本身也是平民的一部分。这种“对立”的心理对于政府与官媒的公信力有极大的影响，也会成为社会治理的阻力。

第三，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健全是民粹主义滋生的制度因素。就国家层面而言，各项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政府工作方式有待探索。国家制度与政策在全局层面上起导向和把控作用，应以照顾全局为立脚点，然而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各地区实际情

况均有不同特点。如果实际执行当中对一般与特殊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理解不准、把控不当，就极容易出现“一刀切”的机械行政现象，一些单位为了在政治上不出错，对上级政策与指示生搬硬套、武断执行；个别基层工作人员不够谦虚谨慎，在与群众打交道时摆排场、端架子，可能会伤害群众感情，给群众的生活造成不必要的不便与损失，也影响了政府部门作为一个抽象整体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与可信度。

第四，媒体与自媒体工作者及参与者的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不够强，是民粹主义滋生和泛滥的主体条件。网络上各类以个人为主体的公众号不计其数，门类各有不同，在出现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时却都能够不约而同地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愈加式微，其影响力远不如自媒体行业。一个中等规模的公众号，能有 20 万粉丝，这些粉丝量基本相当于一个地级电视台的覆盖量。这个量的意义又有所不同，因为网络平台关注的自主选择性，可以说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数量就等于它的精准受众数量，而地级电视台的覆盖只是一个范围性的数字。因而自媒体工作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会对粉丝群造成切实的影响。传统媒体人在上岗前都经过了专业的培训，确保从业者具备必要的专业素养。而自媒体从业者在成为传播主体前并不一定全部经历过系统的学习与培训，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素养不得而知，这就增加了这个群体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

对民粹主义本质进行深入探析，避免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解和看法

对于民粹主义，我们不能简单地排斥，而应该对其本质进行深入的剖析，对一些深层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避免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解和看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更好地应对民粹主义泛滥可能带来的问题和威胁。

首先，西式民主与民粹主义不同。西式民主起源时面对的根本问题是限制王权，后来逐渐演变为限制国家权力，保障资产阶级的自由、权利和财产私有。需要清楚的是，限制国家权力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被少数人滥用，从而造成不良的后果。而若将全体平民的意志凌驾于国家决策之上，也会造成不良后果。民粹主义是一种将民主极端化的思潮，它恰恰主张一切政治与经济的权利都要均分给平民，认为政府和精英是压在平民头上的大山，是既得利益集团，其行为目的往往都是维护既得利益而损害平民利益。近两年国际层面出现的闹剧似乎能够说明，民粹主义一旦引领国家政治大势，极其容易使整个国家“行差踏错”，而这造成的是每个平民都无法承担的后果。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不是支持民粹主义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这一结论是在一个长期、纵向的历史语境中提出来的。全部的社会财富，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中的创造成果。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出自无产阶级，又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就是人民群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而得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式。事实上，相对西方民主一人一票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决策层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走进人民大会堂参与国家政治讨论的人民代表，每一位都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领域具有卓越的优势，在国家决策层面，理性、大局观、全局观是不可或缺的。若一味追求绝对平等，将政治决策权均分给每一位公民，则很难保证全局和战略方向不出偏差。因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确保障政策、决策结果是在一个相对理性、顾全大局的范围内。

最后，中式民主有其历史渊源并独具特色，这就是建立在团结之上的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西式民主借着全球化的东风，以各种形式向全世界输出其价值观，民粹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根发芽，离不开西式民主的铺垫。这些价值观的传入对我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过分强调个体引起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忽视整体。在世界舞台上崛起，赢得世界尊重的，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哪一位单个的中国人。退一步讲，没了中国，何来中国人？我们从何处来，能往何处去？分崩离析的国家即使能为个体带来更多的利益和更好的发展，那也是少数杰出人物，而多数的平民，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甚至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時候，谈何自由，谈何平等？我们在鼓励群众自我意识的同时，也应当强调，只要一日作为中国人，就是构成中国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整体的发展建立在部分发展的基础上，也离不开各部分之间的合理的结构安排。整体与部分是相辅相成、一荣俱荣。整体的繁荣昌盛离不开每个个体的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离不开个体之间的团结协作。团结，才是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根本力量。

民族主义思潮的理性与非理性

张彦

2017年，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围绕国家主权安全、国家统一、文化自信和海外人员言行遭遇等主题呈现出新的动向和特点。

聚焦主权安全

国家利益的受损往往会使国内民众掀起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潮，如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事件”和“萨德事件”等。2017年，涉及国家利益特别是领土主权安全的事件依然是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涌现的导火索，如中印洞朗对峙事件、朝核和萨德问题等。

2017年朝核和萨德问题是2016年矛盾的延续和深化。2017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一有新态势，中国民众就会在网络上作出回应。绝大多数国内民众站在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对朝鲜、韩国和美国的有关行为表达了强烈谴责和不满。国内民众对待朝鲜的态度是认为其不顾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屡次进行核试验，威胁中国东北安全；对待韩国的态度是认为其不顾中方严正交涉依然引进和部署“萨德系统”，对中国战略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对待美国的态度是认为其在东北亚拉动韩国、日本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搅动东北亚和平稳定局面。可以看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国内民族主义者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也给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民意上的支持。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涌现下，赴韩游客明显减少，一些民众发表“国家面前无偶像”等类似言论。中国外交部在回应国家限制中国民众前往韩国旅游的指责时就指出，中韩交流合作要有相应的民意基础和舆论氛围。

印度成为2017年国内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指责对象。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引燃了中印两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国防部长发表所谓“2017年的印度和1962年的印度已经完全不同了”的言论。同样，

我国互联网平台上也充斥着民族主义的声音。一方面，民众因为中国政府、军队以及党报的密集强硬发声而欢欣鼓舞，支持中国政府和军队采取强硬措施好好教训印度；另一方面，又因为中国政府一再释放善意、保持克制以及没有切实举措而指责中国政府懦弱，对此表达失望和不满。

中国自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侵略，遭受侵略和凌辱，中国民众由此形成了“受害意识”。每当他国做出挑战我国领土主权以及威胁我国安全的行动，就会激起国内民众的“受害意识”，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往往与民粹主义交织在一起，一些民族主义者通过翻出历史旧账以及发表极端言论等方式，掀起国民仇恨，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试图胁迫政府采取强硬态度，给政府制定对外政策造成巨大压力，可能影响国家整体战略安排。而当政府的举措和行动不能遂其意时，民族主义又将矛头转向政府。

合作与发展已成为当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题。因而，在两国出现纠纷和争端时，民族主义尤其是两方的民族主义都一味以本民族利益为导向，反而会进一步激化两国之间的矛盾，无益于问题的有效解决，也不利于长期的信任与合作。

聚焦国家统一

近几年，两岸关系和香港“一国两制”实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牵动着大陆（内地）民族主义者的神经。

2017年，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总体保持克制，不过仍有不少小动作，引起了大陆民族主义者的关注。这一年，蔡英文主要从机构变革、文化台独和“去蒋”三个方面进一步实施“去中国化”：废除了拥有近九十年历史的“蒙藏委员会”，修改中小学课纲等。面对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去中国化”行径，大陆民众纷纷指责民进党“倒行逆施”，有民众认为要对民进党“面上台独”不成、

转而进行“面下台独”的活动给予足够警惕。另外，蔡英文12月11日接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时指出“台湾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相关方，可以在这个区域作出更多的贡献”。对于蔡英文的言论和企图“挟洋自重”的行径，大陆官方和民间均指责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台湾问题上，2017年发生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事件也使许多民众在网络上纷纷谴责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更进一步表达了坚守自己的立场、坚定推进祖国统一的决心和意志。

香港自“占中事件”之后，“港独”言论和行为一直非常活跃。2017年9月4日，香港中文大学校内出现许多带有“港独”字眼的海报和横幅，5日晚，一名内地女生撕下“港独”海报，与蹲点的记者和“港独”学生激辩民主，怒斥张贴“港独”海报的所作所为。内地民众得知该事件后，纷纷声援内地女生，称赞她英语流利、思维敏捷，撕开了“港独”假民主的面目，勇气可嘉。同时网民对“港独”分子占领墙面、贴出挑衅基本法的言论以及语言粗秽的谩骂表示失望和不满，要求校方严惩“港独”分子，并认为香港的政府和教育界应当好好反思。

2017年12月16日，香港港专学院发生“港独”学生侮辱国歌事件。该校在当日举行毕业典礼，校方在事前已公布典礼中播放国歌的相关规则，但仍有两名应届港专毕业生在奏唱国歌环节没有起立，后被校方要求离场。港专校长陈卓禧在典礼结束后与涉事学生进行对话，指出港专是一所爱国爱港的学校，这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即使在殖民地时代也没有退缩，认为学生要尊重这一场合和学校立场。消息传到内地，民众纷纷为这一充满正义感的校长点赞，认为他的回应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当前中国，民族主义从民族复兴、民族团结出发，表现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强烈意愿，这一点与爱国主义是相通的。但民族主义往往还带有许多非理性、情绪化的极端言论表达，特别是今天大陆（内地）的发展拥有了对台湾和香港的绝对优势下，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始反过来讥讽、嘲笑甚至敌视台湾和香港，需引起重视。

聚焦文化自信

2017年激发民众强烈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凸显民族文化自信、抵制西方文化渗透的事件主要有《战狼2》的热映、外国人评选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十九大前多部大型政论纪录片的播放、央视推出《国家宝藏》节目等。

《战狼2》自2017年7月27日上映以来，接连打破多项华语票房纪录。影片上映正值中印边界冲突，进一步激发了国内民众民族主义情绪，街头巷尾人们讨论《战狼2》的话题不断。《战狼2》“杀我国人者，皆我天敌”延续上一部《战狼》“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霸气口号，让民族主义者精神振奋。特别是影片的最后，主人公带领华资工厂的员工撤离途中，手举五星红旗穿过交战区，武装分子主动停火让他们安全通过，这一幕让观众热血沸腾，也让民众感到深深的自豪感。

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2017年5月，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个国家的青年评选出了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这些创新让世界惊叹，也引起了国内民众普遍的自豪感。“购物点鼠标、付账刷手机、旅行坐高铁、扫码骑单车”，民众享受着科技创新带来的便利和福祉，纷纷为祖国的科技进步点赞。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央视推出系列纪录片，如《辉煌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以“厉害了我的国”为主题的大型内容纪录片

等，全面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纪录片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网友纷纷以“厉害了我的国”跟帖评论，流露出对祖国由富而强的自豪感。

另外，2017年12月初央视播映的《国家宝藏》通过对国宝进行前世今生的演绎和讲述，让观众在历史与现实中充分感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节目播出后受到广泛好评，民众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无不惊叹和赞美，纷纷用“此生无悔入华夏”来表达自己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

2017年世界各地爆发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世界被恐怖袭击阴霾笼罩。面对这样的情景，国内民众纷纷感叹“我们不是生在和平的年代，而是生在和平的国家”，都为祖国的和平稳定、繁荣昌盛感到骄傲，也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民族自信是指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认可、对自己民族取得成就的自豪以及对自己国家发展前途的信心。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被列强侵略欺侮，中国民众一直被“民族自卑感”所困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震惊世界，这也让很多民众的心态发生了改变，开始以一种自豪的态度来看待自己民族的文化 and 成就。

聚焦海外人员言论与行为

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的言行及海外遭遇成为引燃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新焦点。2017年5月21日，中国留美学生杨舒平在马里兰大学毕业演讲时称自己家乡昆明的空气质量很差、中国的空气肮脏不堪，而且缺乏自由，而鼓吹美国的空气“又甜又鲜”，充满自由的气息。杨舒平这一“辱华演讲”传入国内，立即在国内掀起巨大舆论风暴。一时之间，谴责杨舒平及其言论的声音充斥网络，用“媚外”甚

至“跪舔”等词形容她，许多网民无法容忍其对祖国的诋毁，有些网友对杨舒平进行了人肉搜索和人身攻击。

另一个在美女留学生的遭遇也引起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积极关注。2017年9月18日，一中国女性公民在亚特兰大被其白人男友杀害。国内民众得知该案件消息后，纷纷在网上留言要求美方尽快缉拿嫌犯，予以严惩。也有一些民众甚至表达“该女留学生不值得同情，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男友”等言论，表现出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2017年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在关切国家、民族利益和认同民族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更加理性和自信的精神面貌，但仍然有一些不理性、不成熟的方面。有国外学者对此指出，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面子民族主义”，即它具有对任何藐视中国尊严的行为的敏感性，具有运用“胜利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话语解读与“他者”互动的历史与现实摩擦、以保存国家“面子”和尊严的习惯。面对民族主义思潮正反双重特性，我们要积极引导，防范和化解其非理性因素带来的不良后果。另外，当前网络已成为民众发声的主要平台，我们还要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增强网络舆情研判和引导能力，积极化解非理性言论。

是什么激化了民族主义情绪

胡 近

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有一些新的情况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在全年态势方面：波浪式起伏，偶有峰值，总体趋于平稳。2016 年，中国在国际上连续遭遇了一系列风波，将近年来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推向了一个顶峰，2017 年的民族主义动向与趋势在影响范围和波及程度方面呈现一个平稳与回落态势。

在发生场域方面：线下行动减少，网络空间居多，“网络民族主义”是当前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中印洞朗对峙问题上，国内民众主要是在网络社交媒体上通过发帖、转发、评论等方式对印度进行“讽刺”和“戏谑”，对中国外交、国防等部门的严正声明表示支持和点赞。

在参与主体方面：既有“自干五”和“小粉红”，也有“愤青”和“键盘侠”。如今，青年人和“草根”作为民族主义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群体性特征上的差异愈发明显，在情绪表达方式上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在涉事对象方面：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成为今年国内民族主义思潮针对的主要目标，港台问题依然是重点关注的对象，美日两国稍退而居其次。随着中国近年来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国内民众在面对相关事件时，态度开始变得更加自信和理性，甚至是采取一种娱乐式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主张。

在存在样态方面：在网络时代，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之势愈发明显，且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在此过程中，民粹主义扮演了一个非理性的工具，不断推动着民族主义的狭隘化、排外化发展。

2017年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特点有：首先，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问题仍然是民族主义激化的主要触点。在民族内部发展动力和外部影响压力相互作用的刺激下，一方面是中国的“大国崛起”势必会影响到某些国家的既得利益，难免遭到压制与抹黑；另一方面是受传统地缘政治影响，国家领土纷争加剧了地区之间的摩擦。其次，网络化加剧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非理性表达。网络赋权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意见表达的权利与渠道，不同网络群体成员内部之间互相暗示、互动、感染，在青年亚文化的作用下，新一代年轻人在热情与抵抗中使得民族主义又呈现出“泛政治化”和“泛娱乐化”特征。再次，网络消费文化背后的资本逻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网络社交媒体中，一些“营销号大V”极力追求着博文点击量的“10w+”，而一些“民族主义事件”往往被看作是“跟节奏”的最佳营销素材，有人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社交媒体民族主义生意”。

在涉外事件中，针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类别，有几种不良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在南海争端中，争执对方多为一些相对弱小国家（当然其背后实质为大国角力），国内网络舆论中常常出现一些过激言论，虽然是一种对维护祖国正当合法权益的真情流露，然而也难免会折射出一种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不利于中国和平友好国际形象的构建。在以往的南海问题上，就曾有国家借此为由对中国指责发难。二是国内目前民间舆论一定程度上存在“轻视”台湾和印度实力的现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整体实力快速提升的背景下，一种过高的乐观主义和民族优越感苗头逐渐显露。诚然，树立大国自信无可厚非，但是也要警惕“捧杀”，倡导武力解决问题的舆论倾向并不真正有利于国家周边安全局势稳定。

从国内来看，要警惕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加强网络舆论的正面宣传和积极引导。一是扎实推进民族宗教工作，积极引导网

络上的“大民族主义”负面情绪，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所讲：“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二是谨防文化民族主义上的保守主义倾向，应当秉持坚定文化自信与坚持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观。三是加强新生代青年的网络正面引导和教育。例如针对“小粉红”“自干五”等一些爱国青年，要把他们正确引导到理性的爱国主义道路上来，防止其走向群体狂热，从而避免他们蜕变为极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者。

2017 年度生态主义的“三种色调”

张云飞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理念已经深入人心。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要求。缘此，中国生态主义也处于现在进行时当中。当然，这种思潮不是单一的，呈现出多元色调，彰显着不同社会主体在生态议题上的不同心态和取向。因此，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引领生态主义思潮仍然任重而道远。

黑色：邻避主义的纠结

尽管从“求温饱”到“求环保”已成为我国的普遍社会心理，但是，面对现实利益诱惑，民间往往持有“邻避主义”的立场。这是当今中国违背生态文明理念的黑色态度和黑色行为流行的重要原因。

“邻避效应”是美国民众在环境抗争中提出的口号。由于担心在社区周围修建垃圾处理厂造成的二次污染会危及其健康和安​​全，一些社区民众提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口号。这一口号反映出一些美国民众在环境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既赞成环境保护政策，又担心自己利益受损。这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典型表现。我们可以将具有这种态度和取向的绿色思潮称为“邻避主义”。2017 年，邻避主义在中国有所抬头。企业一般不拒绝环境责任，但是，实际效果甚微。2015 年 7 月，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以期能够有效解决地方环境治理不力的问题。继 2016 年督查取得重要成效之后，环保督查风暴于 2017 年再一次在中国大地掀起。但是，这次督查遭遇到了民间的反制。一些人士质疑，督查导致企业大面积停业，工人大批量失业，闹得民怨沸腾。这样用民生来绑架环保督查一度成为社会热点。这里，不仅折射出人们在环

境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心理，而且反映出人们在环境公共产品和个人私人利益之间的纠结态度。其实，只要反问一下，事情就可真相大白。在资本趋利本性的支配下，在没有进行环保督查的时候，有多少企业尤其是污染企业真正考虑过民众的健康和工人的安全等问题？

部分民众对绿色生活方式的疏远。随着移动支付支撑的电子商务的发展，现代外卖行业得到迅速发展。这种新业态，带动了就业，拉动了增长，方便了生活。据《2017 中国本地生活 O2O 行业研究报告》初步估计，2017 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 O2O 市场规模为 9780 亿元，接近 1 万亿大关。但是，这种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据估计，每周将产生数目巨大的一次性外卖打包盒，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后果触目惊心。长期以往，称之为生态浩劫并不夸张。

外卖行业的客户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环境意识。其所以仍然选择消费外卖产品的生活方式，除了方便、快捷等原因之外，还与“宅生活”有关。这里的逻辑是，只要与己方便，哪怕洪水滔天。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邻避主义。当然，“宅生活”的形成与动漫、网游进入日常生活有着复杂关联。这里存在着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领导权之争的问题。对此，2017 年 6 月，美团外卖联合有关方面推出了《绿色外卖行业公约》。这无疑是外卖行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具体体现，有助于生态主义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当然，不能就此止步。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同样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总之，在绿色成为社会时尚的同时，黑色生产方式和黑色生活方式在民间依然存在。这里的要害是邻避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无关。

绿色：生态中心主义的迷恋

长期以来，“生态中心主义”渗透在中国学界的话语权中，并对民众心理和政策话语产生了较大影响。2017年，这种思潮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超越工业文明。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深绿”人士将工业文明作为批判对象。他们认为，工业文明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应该转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这种立场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生态主义的走向。2017年，一篇1995年发表的题为《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文献受到了“深绿”人士的热捧。该文声称，“工业革命及其后果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二者极大地增加了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的预期寿命，但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性，令生活空虚无谓，剥夺了人类的尊严，导致了心理疾病的扩散，还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界”。“深绿”人士认为，该文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相当深刻。

从逻辑上来看，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根本不是同一个序列的概念，因此，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主张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从思想内涵来看，在“深绿”语境中，市场经济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等话语被遮蔽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传统工业化道路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区别被忽略了。另外，上述文献的作者是一个发起暴力攻击的现代文明逃离者。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生态恐怖主义。

回归乡村文明。与超越工业文明的主张相一致，一些“深绿”人士向往乡村文明。在他们看来，乡村文明的本质是“耕读文明”，通过“耕”来满足物质需求，通过“读”来提升精神境界。这样，就可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均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均衡。这恰好是工业文明所缺乏的东西。因此，中国乡村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的时代契合性。

问题是，“耕”能否对抗“船坚炮利”，“读”能否迎来“科学与民主”？当然，“深绿”人士将之视为现代性的“病症”而一概拒斥。

也有的人士认为，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存在着精耕细作的传统，具有明显的亲自然或亲生态的特征。因此，绿色技术支撑下的相对分散化经济应是未来绿色社会的一个积极性表征。问题是：精耕细作是有机农业的重要特征，与小农经济无关。小农经济是前商品经济的经济形态。有机农业是超越石油农业、发展生态农业的历史资源。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成长的烦恼”。同时，要协同推进“新四化”和绿色化。

回归传统文化。与超越工业文明、回归乡村文明的立场相一致，近些年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生态智慧成为一种重要动向。面对“言必称希腊”的教条，这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文化自信。2016年年底，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传统文化与生态哲学分会成立。2017年年底，第八届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17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许嘉璐教授与美国学者小约翰·柯布院士开展了“生态文明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对话。确实，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中庸勿我”方法论、“民胞物与”价值观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我们需要“原乡”思想。在我们看来，在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意蕴的同时，关键是能否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造性发展，能否对之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

红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追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重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雄心壮志，指明了中国生态主义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命题，科学指明人与自然之间是通过物质变换构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因此，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思想、恩格斯关于人自身和自然界具有一体性的思想。这样，彻底终结了生态中心主义挑起的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抽象争论，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了哲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进而，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要求，科学揭示出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要在需要体系中的基础性、独立性和专门性，科学揭示出生态环境需要同时具有的满足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的价值，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依赖自然而生活的思想。这样，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和一致好评。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门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的报告。进而，党的十九大修改后的党章明确提出，“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这一命题科学阐明了自然价值和经济价值、自然资本和经济资本、环境和发展、生态化和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加上自然界是一切财富源泉的思想。这样，有助于全社会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有助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进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美丽”纳入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要求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表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物质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前提地位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有助于推动我国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意义。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这一点，呼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一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这样，协同推进“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建设，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广阔视野和开放胸怀。

显然，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彰显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科学价值，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生态主义的正能量和新向量。

在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的关系上，或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前面的社会主义纯粹是修饰语；或认为，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2017年11月，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单位发起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2017年学术年会上，延续了这种讨论，这是生态主义多元色调的体现。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生态文明领域中的表现和表征。目前，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凝聚社会共识，这样，中国生态主义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正确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警惕消费主义消解社会发展根基

张旭

“双十一”火爆背后的社会思潮

近年来“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已成为一种独特文化现象的新指标。2017年电商“双十一”再次刷新历史记录。据悉，阿里巴巴和京东“双十一”交易额达2953亿元，其中阿里1682亿元，京东1271亿元。这一源于淘宝商城自2009年11月11日借助网络进行销售的“消费”狂欢，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典，逐年攀高的销售额度，甚至影响到了国际电子商务全行业。2014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双十一全天交易额571亿元。2015年11月11日，天猫双十一全天交易额912.17亿元。2016年11月11日24时，天猫双十一全天交易额超1207亿。2017年双11开场11秒钟，淘宝系交易额超10亿，3分01秒成交额超百亿元。当人们仍然沉浸在这场狂欢余味中的时候，各种不同的评价也接踵而来，持赞赏意见者，认为丰富了消费的渠道和内容，带动了生产、包装、物流等各相关行业的发展；持反对意见者，认为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助长了奢靡之气；持中性意见者，认为此风不可长，消费应该逐渐回归理性。

事实上，借助互联网进行商业销售和消费者利用互联网的便捷进行消费，本来就是简单的买卖双方的合意行为，本无需大惊小怪。西方媒体所惊呼的也无非是中国人真的太有钱、太富有了，与他们以往认识的贫弱中国不相称。可是，当我们仔细梳理这一消费行为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蕴的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简单地肯定和否定，而是需要对这一消费行为背后所展示的社会思潮进行认真的考量。

人们往往认为，是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商业模式的变革，才有了今天的“双十一”的火爆。而实际上这现象的

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作为当代中国消费主义集中表现的“双十一”现象，绝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音，恰恰是资本的福音。

消费主义的五个基本价值主张

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在资本的驱使下，人们的生产不仅不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不是为了满足特殊的需求而交换，而是为了资本的增殖。于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物品不归自己所有，而归资本所有；人们自身的劳动力也不归自己所有，而归资本所有；人们为了获取自身生存的基本条件，必须为资本服务以获取工资，再用工资来购买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于是，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物品带有了神秘的性质，这个物品甚至可以左右生产者自身。也就是说，从事生产的劳动者成为了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附庸，决定生产者的不是生产者自己，而是自己亲手生产出来的产品。

当人们还不能从物与物的关系后面揭示出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就必然把商品关系神秘化，从而产生商品拜物教的观念。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对商品的追逐演变为对出售商品获得的货币的追求，于是从商品拜物教派生出货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进而产生资本拜物教。具体的表现就是“物欲横流”。

所以，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地方，都出现了对于劳动者自己生产物的崇拜。人们追逐作为个体消费水平提高的快感，而事实上是受制于自己生产出来的、应该为自己服务的商品。“炫耀”成为一种时尚，一个名牌皮包的价格甚至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在“双十一”狂欢中下了多少个单子，也成为炫耀的谈资。出国花费了多少金钱进行购物，成为衡量彼此身份的标识，而完全忽视了出国所应有的多元价值。消费逐渐演变为一种畸形的“消费文化”，甚至形成了具有宗教色彩的“消费主义”思潮。消费主义的形成，正是资本主义生

产所需要的：资本通过控制商品，而控制了每一个人，进而控制了每一个人的行为及其认知能力。

概言之，消费主义思潮表现为五个基本的价值主张：奢侈消费才能获得幸福感；消费奢侈化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只有在奢侈消费中才能获得存在感和认同感；人生的价值表现在消费奢侈的程度上；人生的价值就是多挣钱多消费。在这样五个相互关联又相互递进的价值认同基础上，人们的行为逐渐受制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观：拥有金钱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法律法规、伦理道德、亲情友情、人文艺术等都被鄙视，甚至这些如果影响了对金钱的追求，那么，这些关乎人的全面生存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被肆意践踏。

人不仅成为了“单向度的人”，而是完完全全沦为金钱的奴隶。当由对奢侈消费的追求固化在带有等级、特权色彩的“品牌”商品上的时候，进而固化在思想上“有钱就有了一切”“有钱任性”“有钱即成功”的意识形态上的时候，对金钱的追求就最终使每一个个体成为资本的帮凶。而事实上，当这一价值观成为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的时候，向“吸毒”的瘾君子一样沉醉于“赚钱—消费”模式中的时候，资本的狞笑被消费狂潮所掩盖，每个人都成为资本盛宴上的祭品。

资本增殖逻辑与大众消费滥觞

从历史上看，大众消费文化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但最早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现象，是大危机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购买（消费）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29—1933年自美国发生从而席卷全球的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消费对于资本增殖的异常重要性，于是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

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导。在理论上崇尚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在政策上就要求政府在消费领域进行“创新”，即通过各种方式创造不断增长的需求，以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

信用制度被“创造性”地具体化为“信用卡”制度，用未来的收入来为现在的消费买单。在中国，这种行为被称为“寅吃卯粮”。消费被极大地刺激起来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得到了满足，资本为了增殖而导致的生产过剩被化解了，大众消费文化从此滥觞，并逐渐成为低收入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经典模式。过度消费或“透支”消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而进行的扩张性生产，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扩展到全世界。但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疯狂透支消费和疯狂生产的结果是造成了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问题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成为了阻碍资本增殖的因素。1968 年 4 月，在阿涅尔利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始研究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探讨什么是全球性问题和如何开展全球性问题研究，“罗马俱乐部”由此诞生，对资本的“原罪”和“现罪”进行系统的讨伐。但是，地球是广阔的，资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全球性的掠夺，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将污染等产业输出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于是，发达国家继续享受消费文化的成果，而这一成果的取得是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为代价的。

时间转到了 1992 年，一个叫艾伦·杜宁的美国人再次关注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带来的全球性后果。在他写作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和地球的未来》一书中指出，随着购物街的发展，消费已经变成我们自我定位和第一娱乐的主要手段，不仅仅是美国人存在这个趋势，欧洲人和日本人也正在以此为榜样，为追随和推崇个人消费而抛弃了

作为他们生活组织原则的东西。并且，“贫穷国家中较富有的居民也尽可能地模仿我们的消费方式”。

几乎与艾伦·杜宁同时，美国学者E·拉兹洛发表了《决定命运的选择》，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是“21世纪的生存抉择”。拉兹洛提出了所谓的“第五次浪潮”的概念，即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全球化问题的加剧。事实上这一概念仍然是自罗马俱乐部以来思想的当代延续：除了对已经存在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压力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技术等的新进步，这一新进步将已有的问题进一步放大了。对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消费文化的扩张，人类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否则后果是严重的。信息时代带来消费的异常便利化和扩大化，而且导致社会心理对此的放大效应，必将极大地扩展在工业时代所产生的问题。

促进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良性互动，不断推动人们走向更美好需求

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共产党宣言》中告诉我们，人类要生存，首先要吃穿住用，因此首先要进行生产，从而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在生存需求得以满足的基础上，生产就必须满足人们生存的品质，同时进行精神上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良性互动，不断推动人们向更美好需求的方向去努力，最终在生产力极大发展和人的精神境界极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由于我国过去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落后，使得改革开放后迸发出来的消费需求，迅速演化为奢侈消费的膨胀。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对于奢侈性消费的引导已经呈现。某些以“市场”或“精品购物”命名的平面媒体，已经开始以类似今天“标题党”的方式宣扬“50万一双的皮鞋已经在长安街走了几趟了”“10万一块的手表哪里寻找”。加之改革开

放之初由于体制和制度变轨期的漏洞而出现的“暴富”人群的示范效应，使消费主义在我国逐渐发展。

当今已是“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互联网+消费”产生了多样的便捷的消费模式，但在资本导向下的“消费主义”正在消解社会发展的根基。有人说，互联网消费即将或已经造成一代人的“懒惰”。其实，“懒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并不自知。马克思说：生产和消费互为因果，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但是，当过度的消费侵蚀了生产的根基，这种消费又如何能够持久？这种消费能否成为生产发展的真正助力？这是需要我们反思并深思的。

经过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态，在努力地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奋进。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我国 13.8 亿人的庞大人口基数相比，我国各项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没有资格过度消费从而过度浪费，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仍然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重大发展基点。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不是奢侈浪费，不是盲目消费，尤其不能在“消费支撑未来发展”的认知基础上进行“奢侈性消费”。大众消费时代到来了，这是我国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成果，理应人民共享。但是大众消费时代，不是“消费文化”的泛滥，不是“非理性消费”的横流。如果说，“多少算够？”是一种温和的提醒的话，“决定命运的选择”则是振聋发聩的警告。

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但是中国的问题我们亦深深清楚。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引言中的第一句话耐人寻味：“愿尔等躬逢盛事——中国的咒语”。这既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警示，又何尝不是对当代中国的提醒？

泛娱乐主义思潮的政治隐患

陈昌凤

以市场为基础，以网络社会格局转变为背景，加上互联网金融投资的强势助推，娱乐化的蔓延也开始走向垂直化，不仅消解了精英/大众、严肃/娱乐等认知框架，而且解构了事实与虚构、理性与情绪的边界，引起了对“泛娱乐主义”侵蚀主流价值观、威胁民主政治参与的担忧。

信息技术与产业垂直化井喷，泛娱乐主义流变

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在每年发布的系列报告《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中，定期追踪全球 54 个地区娱乐及媒体行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全球娱乐及媒体市场规模在 2017 年底达到约 1.79 万亿美元，从市场绝对值来看，美国、中国、日本仍旧是全球前三大娱乐媒体市场。在此背景下，泛娱乐主义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泛娱乐主义”是商品经济原则在消费、传媒、教育、信仰、政治等多个领域的集中体现，金融和资本的渗透使其程度更加深化，成长在“泛娱乐”市场中的千禧一代因其原住民身份而更加难以保持疏离的自反性立场。随着强势资本注入、上市运作等操作，娱乐化的范围扩展，程度加深。娱乐不仅是“主义”，更是“生意”。从全球份额看，中国市场中包括付费视听产业、网络剧、网红经济、电子竞技、虚拟/增强现实等条目的份额遥遥领先，且开始表现出东亚文化圈自有的特色，成为风险投资青睐的方向。

其次，娱乐主义之滥觞与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支持的直播平台、视频网站、智能推送、移动支付等场景密不可分。2017 年热极一时的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打造纯网节目，以“剧集真人秀”的方式更新节目形态，进行 IP 产业链经营方式，创造了微博主话题阅读突破 71 亿的综艺指数峰值，实现小众文化的大众传播。泛娱乐场景的普遍

化消解了传统认知中“严肃/娱乐”的二元对立叙事，挑战“精英/大众”审美旨趣界限，并在一些垂直领域形成市场倒逼机构改革的态势。

此外，泛娱乐主义的话语叙事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化叙事特征，不仅消解了事实与观点之间的界限，甚至连事实本身也不再重要，这颠覆了对理性、真相这些达成协同认知和价值观共识的基本要素。例如，对于2017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亚洲这一政治事件，网络舆论和新闻报道都对其中的娱乐化呈现、娱乐化解读表现出比例失调的极高热情。

有趣即正义？理解“泛娱乐化”的两种思路

泛娱乐化的“泛”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担忧。有文认为，商业化操控的大众传媒及其背后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助推了网络文化的“泛娱乐化”。有文论述，“泛娱乐化”导致的主流价值话语的消解、主导价值格局的销蚀，在政治上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挑战与冲击。这种文化价值提倡个体克制原始欲望，按照社会道德规则约束自己。

除了“过分的娱乐”这种意识形态的立场，还可以采取“普遍的娱乐”这种生活化的立场。如果将娱乐化置于近现代媒介社会的时空背景中观察，这一思潮的普及并非仅仅与互联网技术相联系。时间上，泛娱乐化趋势在信息技术发展历程中有一定的必然性。空间上，娱乐化就是大众的日常生活，那么泛娱乐化现象也是大众文化生活娱乐化向不同领域扩张的结果。从“普遍的娱乐”这一角度看，网民所提倡的“有趣即正义”便不无道理。

因此，持“过分的娱乐化”观点是将泛娱乐主义置于排他性意识形态的思路下予以考量，而持“普遍的娱乐化”是将泛娱乐主义置于平时的、日常生活的背景下考察。两种观点虽没有高下，但均会带来不同的担忧。矫正前者可能带来的隐患是人们的信息被剥夺，受到来自外部的奴役，从而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人们毁于自己所憎恶的

东西。而后者带来的隐患可能更加深刻，如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里所担心的：娱乐让人们丧失思考能力，爱上这些琐碎的信息，然后在海量信息中日益自我和被动，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斜杠身份：多维的政治参与基础

长久以来，“娱乐”被等同于政治冷漠，被视为与“政治参与”相反的力量。英国文化研究学者 Richard Dyer 指出，娱乐是以“乌托邦主义”为要旨的，即娱乐迎合了逃避现实和短暂慰藉的社会心理。那么，“普遍的娱乐化”真的会成为政治不参与的替代性道路吗？

实际上，“普遍的娱乐化”有着“有趣”的外溢政治效应。我们正生活在“认同的崛起”（Rise of Identity）的时代。在泛娱乐主义背景下，“认同”表现出多维并存、快速切换的特点，这与经典社会学中所论述的社会分层形成相互关联而又区别的对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以“生产资料”作为划分社会分层的标准，但韦伯强调“身份认同”——即以生活形态为基础的身份群体——这一文化决定论的划分标准。因此，源于经济基础但又超越市场经济的划分，是认同最主要的特征。在此，网络社会中的认同可以简单理解为“意义的来源”，“有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根基于意义的认同感，在娱乐化群体中的有较强的动员潜力，一旦转化为稍有组织的行动，这种娱乐圈层的行动主义就会表现出政治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强化认同。事实上，有组织的自发网络行为在各种明星粉丝的“应援活动”中已经十分成熟，参与者在多个活动中快速切换多重认同。对明星、游戏、演唱会、足球等娱乐内容的兴趣，对科技、医疗、工程等严肃知识的深度兴趣，均可以细分地形成以兴趣为基础、认同为深层心理粘合的在线社区，并在日复一日的互动中形成联结型社会资本，积累行动基础，继而在可能的刺激条件下转化为线下行动。

这种在模糊了娱乐与严肃之间界限的多重场景之间快速切换的生活模式，打破传统的社会阶层和圈层结构，带来扁平化的“斜杠身份”（Slash Identity）的兴起。“斜杠”的表述源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Marci Alboher 撰写的《双重职业》一书，意思是工作之余运用爱好和才艺从事多个职业，拥有多重身份和多元生活的人群。例如，一位成年劳动者的斜杠身份表现为“中科院研究员/科学松鼠会工程师/科幻作家”等多重身份的并行不悖。多维度的认同是斜杠身份的心理基础，大量非组织网络社区的出现，为斜杠身份提供了平台。斜杠认同不仅是娱乐的生活方式，更是普通人的政治。

斜杠身份的政治参与存在隐患。斜杠身份多表现出快速切换、浅度介入政治的特点。泛娱乐主义因其游戏化、娱乐化属性，非常容易与各类思潮耦合而产生新的变体。“帝吧出征”中就蕴含着娱乐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多样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孟威研究员认为，“2017年，在众声嘈杂的中国互联网新媒体舆论场上，民粹主义在平民化、非主流化为特征的亚文化语境之下，表现出对峙精英主义、挑战既有权力结构等特征”。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泛娱乐主义中表现出来的情绪化的、轻蔑事实的“后真相”特征，深刻威胁到了以理性对话为基础的健康政治生态。后真相（post-truth）指“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表现为政治辩论和新闻报道与政策细节、事实脱钩，真相贬值，情绪盛行。

在信息技术社会中，泛娱乐主义有其“存在即合理”的一面，表现为娱乐在生活各方面的普及，并催生了斜杠身份，为当代青年政治参与提供行动基模和文化基础。泛娱乐主义也带来了一定的政治隐患，其中后真相主义情绪化表达、忽略事实和理性是最值得担忧的问题。

警惕泛娱乐化奴役自我

师曾志

移动互联网使得人们随时随地参与娱乐成为可能，给娱乐商业变现提供了基础；以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消费者，消费能力强，消费观念开放，对于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的需求极大，成为娱乐商品的中坚力量；内容创业、粉丝经济等基于集聚流量再进行流量二次分发的商业逻辑给予泛娱乐以助力；众多企业聚焦电影、音乐、游戏、小说、漫画等产品的泛娱乐战略，使得娱乐更加普及。泛娱乐主义的“泛”还在于娱乐生产及消费逻辑的跨界。社会各个领域或多或少都存在泛娱乐的倾向。

现代人得到片刻消遣满足的同时，资本与技术裹挟在一起不断制造新的语言符号、表现方式，让现代人欲罢不能。资本商业大获全胜，是以现代人献上自我的时间、金钱为代价的。由于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表面上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媒介与观众种种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而现实是关系中真实需要的连接和交流却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泛娱乐化的危害在于人为泛娱乐所奴役而不自知。在大众娱乐中，公民传统政治参与观念变得非常淡薄，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基本理解力在下降，容易成为表面生活的“专家”，娱乐“成为补偿他们自己真实生活的碎片化和生产专门化的人们所认同的表面化生活的证明物”。

泛娱乐主义之“泛”在于娱乐的扩大化和超出了娱乐的建设性功能，反而成为虚假、被动、平庸、遮蔽、控制、默从、偏离等。任何严肃的题材，从政治到社会文化，都可以被瞬间解构与瓦解，能指与所指不再是稳定的符号系统。原始自我是精神活动的原动力，伪自我这个代理，打着自我的旗号，却代表着人被他人期望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泛娱乐时代的景观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伪自我的到处横行，而真实的自我被消解在伪自我之中，无处寻觅。

泛娱乐主义一方面是现代互联网技术的本然要求，另一方是遭遇现代性危机的人们面对强调结构、本源、终极、中心、等级、权威、真理等概念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一种解构与重构，甚至是不屑与厌离。在互联网上看到的真与假、实与虚、善与恶、庄重与轻漫等过往边界清晰的概念，在泛娱乐时代都可以轻易地被打破。公众领域不断地自我私域化，私域化不意味着孤立化，基于共同的信仰、兴趣、爱好为媒的自组织也在泛娱乐主义的场域中欣欣向荣地生长着，个体的私密表达、欲望、体验、经验等都成为沟通空间的主要内容。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警惕的是，伪自我取代了真实的自我，真实生命体验消解于海市蜃楼般的娱乐世界中。

“激进左派”渐成中国学术界“公害”

周少来

“激进左派”，亦称“极左派”，是当代中国“左翼阵营”的“后起之秀”，以其政治立场的极端坚定、极化观点的暴烈鲜明而卓然于世。他们以某些“左翼网站”和地下边缘刊物为主要发声平台，以“反资反美”、激进革命、底层动员、刺激民粹为其核心观点标识，近年来的崛起大有“盖过”其新、老“左派”前辈的势头。但“激进左派”的话语体系及其政治主张中，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逻辑陷阱”，其急欲促发的学术舆论或社会运动，更具有难以估量的“公害”甚或社会危害。对此，值得政学两界给予理性关注和剖析警惕。

“左翼阵营”的“急先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代中国的学界同样呈现各式“群分”。“老左派”“新左派”“中间左派”“激进左派”，同属“左翼阵营”中的“学术友军”，其代际沉浮和学理演进，与其自身学理论证的学术资源紧密相关，也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阶层分化紧密相关。

传统“老左派”的基本学术立场，是固守前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坚持计划经济，坚持公有制，强烈反对市场经济，反对非公经济的发展。因其学术话语难以“与时俱进”，不可逆转地趋向衰落。所谓“新左派”，则是在“老左派”走向衰落之际转向学术舞台，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为学理资源，以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化、反对国际资本的全球扩张为标识，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反对市场竞争机制渗透侵蚀社会，其影响辐射范围仅在“温和新左派”的知识小圈子。2008年以后，“新左派”渐趋理性化学术，也没有激化与“自由派”后续的相争相辩，逐渐回归学院派文人的“象牙之塔”。

正是在“老左派”销声归隐、“新左派”回归学术，“左翼阵营”看似“失落”的空档期，由社会结构变革和阶级阶层分化所激发的“激进左派”，绝地逢生、冲杀而起。以2000年“乌有之乡”网站（现已关闭）的开办为核心阵地，“激进左派”有了自己的舆论发声平台，形成了一个以所谓的“民间学人”为主体的理论圈子。“激进左派”以“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思想为学理资源，以“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论，以反对资本主义和当代修正主义为核心政治主张，以代言和代表底层工农大众为动员旗帜。其学术取向与社会现实指向，是希望通过组织底层民众，造成强大的“底层动员压力”，向政学两界同时博弈施压，并尽可能地影响高层决策。

“激进左派”何以“激进”？为什么要“如此激进”？这正是其与“老左派”“新左派”不同的地方。“老左派”以权力资源为依托，其现实指向针对高层决策，其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的主张多为“隐而不发”。“老左派”影响多在“老干部”的中高层小圈子，其政治信仰的坚定纯洁和自身的正直清廉不乏感人之处。“新左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知识资源依托，其现实指向针对“新自由主义狂潮”，其反对全球化大势、反对资本主义化的主张，也更多地针对知识界的新老“自由主义”。“新左派”之中不乏“学功”深厚者，其西方学术的知识背景和学理资源，使其更多在“思辨的意义”上“纵论中国”，其影响力也多限于“知识青年”的学术圈子。

而“激进左派”崛起于“民间”，既无“老左派”的权力资源，也无“新左派”的知识资源，只能以“立场激进、主张激进、指向激进”相标榜，激发和集聚底层民众的积怨积愤，以裹挟底层民众的“乌合之力”，以期相争相抗于政学两界。这便是“激进左派”何以激进的根本所在：似乎越激进，越能聚合民众力量，越能相抗于权力资源或知识资源；似乎越激进，越能覆盖并替代“老左、新左”，越能成

为执掌“左翼”大旗的唯一旗手。随着“老左派”的日趋“老化”和“退场”，也随着“新左派”的日趋“回归学院和沉寂”，“激进左派”便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声可能，并日益成为时常泛起的“公害”。

极端民族主义的“理论动员”

民族主义是一种古老根深的自然情感，是一种本能地对自身民族的忠诚和热爱，也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民族主义如果走向极端非理性，趋向盲目排外封闭，甚至走向对外扩张、推行民族沙文主义，则民族主义的“正能量”可能畸变为“民族灾难”。历史上各次世界大战中涌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畸变公害”，殷鉴不远，不乏其例。

2017年中国周边局势时有趋紧，“朝鲜半岛危机”几近滑向战争边缘，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猖狂潜行，美国特朗普更是宣布中国为“竞争对手”。加之国内经济增速的趋缓平稳和结构性调整，“农民工返乡潮”及其“下岗失业”人员的隐性增大，似乎都给“激进左派”提供了“事实凭据”和“理论借口”。“激进左派”似乎有了更大的“话语空间”，其强烈的排外反美、反对资本主义化，甚至质疑“全面改革开放”，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演说空间”。

“激进左派”一贯以代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自居，自行占据“道德制高点”，以“冷战思维”研判国际局势和世界走向，枉顾日益紧密的国家合作和国际交流。他们往往简单粗暴地把整个国际力量化分为“敌我阵营”，以“极化思维”和“暴烈语言”，进行“阶级斗争式”的大批判，以期影响和施压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方略。在一些主流媒体和网络论坛中，“激进左派”甚至倡言“中美必有一战”“分分钟横扫台湾”等极端战争言论。此种看似“极端爱国的狂热民族主义”言论，实则是无视国际交往的“竞争与合作规则”，枉顾世界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复杂互利，只是以简单“黑白二分”的“极化思维”，

刺激和动员极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以往的“抵制日货”的狂热运动中，在疯狂打砸和伤及人命的非理性行为中，也可看到“激进左派”的理论逻辑所可能导致的行为后果。

“激进左派”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肆意泛滥，在网络空间中更是无限放大传播，有了“激进左派”与“激进网民”的“上下加热”，“激进左派”具有了极其强大的“激进宣示”和“战略宣示”功效。如果任其“无底线”泛滥，极有可能引起国内外各界的“战略误判”和“政策误读”。

民粹主义的“理论底色”

中国近年来民粹主义的日渐泛起，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根源。社会结构的变迁，阶级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的相对扩大，底层民众就业和生活压力的增加，都为民粹主义思潮泛起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和“民意基础”。但中国出现的民粹化现象及其问题，是一定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问题”，需要不断地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健全民意表达渠道等“技术性手段”来解决。

正是在这一急剧转型和结构性调整的过渡期，不断产生并时有积压的“民生问题”和“民主问题”，为“激进左派”的民粹化主张，提供了一定的“言说依据”和“话语空间”。这是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社会土壤和“民意基础”问题，并且这“一系列问题”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一次性解决”。2017年，西方各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力的崛起，以及由此激发的民粹主义情绪和激进言论的泛滥，更加刺激了中国“激进左派”的道德激情和“言论扩张”。国内“激进左派”的理论逻辑是往往把政策性和体制性的技术改革问题，转化为“底层民众受阶级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问题”，煽动和刺激“底层民众”的积怨和积愤，并一贯把自己“打扮”成“工农大众”的利

益代言人。甚至不惜倡言“阶级阶层革命”，运用“文化大革命的不断革命理论”，为其民粹化言论和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更多地表现为“极左翼民粹主义”，“激进左派”言论与激进民粹主义有着“观点契合的私通暗道”，俨然成为中国民粹主义和民粹化行为的“理论底色”。这在大量“网络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言论中，有极其明显的表现和佐证。

底层民众组织化的“理论代言”

民众的组织化，是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组织基础，是民主社会成长和成熟的组织表现，也是民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聚合的组织中介。法治化、制度化正常规范的民众组织是社会矛盾和民众纠纷的中间缓冲器，有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节与和谐，也是民主法治社会的自治基础。

但“激进左派”的民众组织化取向，存在着理论动员和组织延伸的“逻辑陷阱”。不同于“老左派”之间的政策取向的“政策同盟”，也不同于“新左派”之间的学术取向的“学术同盟”，“激进左派”既无权力资源、也无学术资源可以“依凭”，只有把其理论指向和现实指向“下沉下移”。借力于底层民众，动员于底层民众。这既与“激进左派”的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定位相一致，也与其集聚民众力量向各方施压博弈的政治主张相一致，更是其激进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现实指向的“逻辑延伸”。

近年来，“激进左派”代表人物，频频“深入学校、深入企业、深入基层”，通过各种学术论坛、宣讲报告和群众集会等方式，宣讲其反官僚、反资本、反精英以及反美反日等极端言论。2017年，“激进左派”更是利用毛泽东诞辰124周年之际，深入湖南、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等地，宣传其一些极端激进的“极左言论”。“激进左派”

期冀通过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言论，把底层民众组织化，形成可以随时动员起来的组织化力量，随时可以发动“阶级革命”。

“激进左派”的组织化现实指向，主要针对青年大学生、国有企业失业工人和城市农民工，这是现代城市化生活中最无力和最缺乏组织的庞大群体。这些人群为“激进左派”的组织化指向提供了极其丰厚的社会土壤和阶层支持基础，其中潜藏着“激进左派”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某些“历史合理性”，也是我们绝不可轻视其影响及潜能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如果失业就业的生活压力持续加大、贫富差距长期客观存在，“激进左派”的民粹主义言论的煽动会更有“市场”，其底层民众组织化“理论代言”的角色和功能会更加凸显。

当然，“激进左派”有其发声发言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其“同情”底层民众并为其“代言”的价值取向，也值得社会予以理解和尊重，其刺耳的言论和主张对政学两界也有其警示价值。但是，“激进左派”言论，存在严重的学理缺陷和“极化思维”，其理论推演中存在多重“逻辑缺陷”，其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刺激底层民众的现实指向，其随意诋毁学术对手主张为“汉奸言论”，其肆意挤压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其对学术规范和制度规则的蛮横冲撞，日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公害”。而这一切，对于正在民主法治构建征途中的中国社会，是值得警惕和防范的“变异”趋向。

在徘徊中前进的文化保守主义

陈继红

2017年注定是意义非凡的一年，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助下，读经热、国学热、儒学热、祭孔热等活动热度不减，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持续强劲，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与新动向。

2017年文化保守主义中的温和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

如果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2015年迎来了民间、理论界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首次牵手与合流，那么到了2017年，这种趋势则演化为主流意识形态与理论界的“合谋”。在“合流”的态势下，各方力量实质上是分庭抗礼、自说自话的，而“合谋”则意味着各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些共识，衍生出适当的合力。

在2017年中，理论界标榜大陆新儒家的极端主张虽然时有发声，但并没有继续产出引人注目的理论成果。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温和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其聚焦之地是如何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积极回应，其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中心。理论界的回应基于两个向度展开：一是以意识形态诉求为主题的各级各类学术会议的召开，如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儒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研究者，不但使中国的意识形态在世界学术交流中得以输出，而且推动研究者结合意识形态的诉求开始重新思考儒学的当代发展方向和路径。二是通过学理阐释证说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如“创造的继承”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哲学诠释学的视野下澄明了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内在精义；又如以“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礼有三本”等传统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性资源，等等。

上述文化现象表明，主流意识形态与学术界的关系已经从“合流”转向了“合谋”。并且，这种趋向亦存在于理论研究之外，一个典型性的表现就是各级政府对传统文化研究机构进行持续的深度介入。如山东省宣布将依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建设“中国儒学院”，这个机构将与山东省共同开展“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对我国流传至海外的珍贵古代典籍进行调查、编目、影印、回归，建立全球汉籍资源数据库，等等。

众所周知，确立儒学在当代中国人主流信仰与主流价值中的地位，是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价值选择方面的核心主张，而上述合谋的趋向则使这种主张在某种程度上被部分地遮蔽了，传统文化被理解为一种解释性资源或思想理论基础的思想倾向逐渐明显。但这并非意味着地位之争已经完全退场，中华传统文化重回当代主流价值体系的呼声依然存在。

问题转向：从中西古今之争到世界文化秩序重建

自近代延续至今，中西古今文化的关系从来都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在2017年召开的几次重要的哲学对话中，这个基本问题的重大转向趋于明朗，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参与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替代性的新的基本问题。

对中国道路的关切是推动此种转向的首要致因。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一种观点认为，致力于追求独特发展道路的中国，应当传达开放的、多元的、自省的文化信息，而不应当走封闭的民族主义道路，后一种道路所带来的后果将是中国无法承担的。因此，传统文化必须走出古今中西之争的狭隘传统，去拥抱更加宽广的全球世界。杜维明先生重新阐

释了“精神人文主义”思想，他认为，“精神人文主义”是一个正在涌现的全球性论域，作为一种综合而整全的人文主义，它结合了人类经验所共有的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个维度，以界定人类繁荣昌盛的最高体现。它不但是是一种思想理念，也是当代中国应当践行的文化理想。

如何应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对称危机，也是促动此种问题转向的重要致因。2017年，在《变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的不对称：当代汉学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中，国际儒联副主席、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基于中西书籍翻译交流中的不对称现象，得出中西文化交流实质上是以西方文化的单向输入为主导的结论。在他与姚新中先生的对话中，这种不对称问题亦被认为是导致儒家形象传播发生偏差的致因。出于此种危机意识，如何通过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使其面向世界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必须回应的问题。

事实上，文化交流不对称的危机早已存在，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工作即是政府应对危机的重要表征。与政府的外在途径不同的是，理论界表达了一种内在途径：只有在理论建构上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才能真正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赢得一席之地。基于此，一些相关理论问题得以被深度探讨，西方个人主义与儒家伦理的关系、儒家文化如何应对当代科技的挑战等话题受到关注。而在郭齐勇先生所著的《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中，更是汇聚了儒学与各文明的对话，囊括了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等诸多理论问题。

此种问题转向亦将中国哲学的现代建构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中国哲学应当成为世界哲学立法的参与者，以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与独特优势拯救现代性的偏弊，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

中西古今之争依然存在，它并没有被新的问题完全取代。这种现象表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方面努力建构一种开放的心态，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打破旧有思维方式，因而注定只能在徘徊中前行。

理性趋向与功利趋向携手同行

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生活世界？这个“接地气”的话题使理论与实践两大层面实现了对接。虽然观念分殊一如既往地存在，但理性反思已经成为共同的趋向，其中也不乏功利色彩。

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探讨具有持续的热度，理性反思主要基于两大问题展开：一是对少儿读“经”利弊得失的反思，正反两个方面的观点在理性层面展开论争。肯定性的观点占据了上风，人格教育、人性开发、教育规律等成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二是对传统文化教育路径的反思。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承认公共教育体系之外的书院、私塾的合法性，使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提升、完善中国教育体系；另一种意见则希望通过公共教育系统的自我完善推动传统文化教育，认为学校的各门课程、教材与读本中应增加传统文化的内容，包括民族、地区特色等文化因素，还可以专门设置一门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教材编写、师资队伍培养、国学学科设置等，被视为重要的担保因素。基于这种观点，大学教育应当为中小学教育提供多方位的支持。这种理念在教育实践中已经有所体现，如大学教师走入小学讲授传统文化经典，就示范了一种具有尝试性的教学模式。

具有功利色彩的引导策略，使传统文化的普及之途看起来更为顺畅。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全国中学生国学大赛暨国学等级考试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启动，这次活动受到了国内顶级的高校、研究机构、出版单位及知名媒体的追捧。其中蕴含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优胜者将获得与北京顶级高校专家学者及优秀大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并将获得国内一流高校的推荐资格。

儒商文化的重新开掘是广受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这个曾经大热的论域近年来一直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2017年开始重新回温，商业经济发展的功利诉求是其不可忽略的动因。理论界对此持理性立场，学者们既看到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相悖的重大短板，也希望结合时代特点开掘其良好的精神内核。黎红雷的《儒家商道智慧》是此类研究成果的代表，这本著作总结了中国企业家运用儒家思想经商办企业的实践，归纳出当代儒家商道的八大智慧。2017年召开的博鳌儒商论坛年会暨首届博鳌儒商人物典礼，首次面向全球发布博鳌儒商榜评估体系，以儒家美德“德义信智仁勇”作为结构框架，表明理论界与商界达成了亲密合作关系。

此外，理性趋向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内部的自我反省。针对当前的儒学热，不少学者清醒地认识到，有高潮期就一定会有消退期，儒学只有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并根据时代特点展开新的诠释，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成为现代的、活的儒学。基于这种思路，对心性儒学、政治儒学、贤能政治的反思或批判并没有停止，尽管以往的热度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反省也体现在对“女德班”“读经热”等文化现象的批评中。

当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内部的复杂性决定了理性趋向与非理性现象共存的必然性，对传统文化不加思考的狂热追捧在民间活动、文化活动中依然活跃，这其中不乏浓重的功利趋向，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严防历史虚无主义解构主流意识形态

黄楚新

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技术的便捷性和开放性为民众实现自我赋权提供了便利，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表达态度和观点的最主要途径。2017年，我国及世界处在多个历史重要节点和重大纪念活动时期，一些错误思潮和政治谣言借机兴风作浪，制造事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再度沉渣泛起，借助互联网媒介明目张胆地宣扬其错误言论和历史观、价值观，企图达到误导舆论、扰乱视听的险恶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热点事件层出不穷

一是借助国际时事，全面质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如借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列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清算”，解构我们党的历史，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否定马列主义。例如，俄罗斯民众捣毁列宁像等事件，否定俄国“十月革命”，被别有用心者用来否定中国革命的理论根基和实践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攻击与负面冲击。

二是置历史发展大势于不顾，以碎片化历史细节“否定”和“还原”历史整体。如2017年初，有人打着“揭秘”“女权”“人道”等的幌子，擅用自己与先辈相比所拥有的回望历史的权力，肆意否定党史国史军史，鞭挞先辈们参与创造的大历史，否定和亵渎先辈们在推动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三是网络上开始出现多种形式的“恶搞”来亵渎历史，解构民族记忆和民族情感。如上海某公司为追求商业效应和经济利益，非法制作并传播含有明显戏谑色彩的“慰安妇”老人表情图像，公然践踏道德底线，罔顾民族情感和民族记忆，将那段苦难和屈辱的民族历史娱乐化。在消费这段痛苦历史的同时，让更多人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之中，

并开始健忘历史，无疑是对历史和民族的背叛。另外，近期《黄河大合唱》被恶搞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巨大轰动，这种恶搞和篡改经典作品的行为在挥霍和愚弄民族精神与历史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解构和消解着道义底线和主流价值，使得民族记忆和价值认同愈发虚无。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范围持续扩大

2017年，伴随世界形势大幅变革和调整以及国内改革转型的持续深入，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也越发复杂多变。在此情景下，历史虚无主义者趁机四面出击，不断变换调整策略，全面攻击和消解党史国史军史，影响范围持续扩大。

一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手段愈发多元。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通过丑化英雄、诋毁领袖、否定革命、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历史成就与发展成果、美化反面人物、美化侵略历史、曲解史实、曲解指导思想等行径实现其“虚无”的目的。现在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正表现得越加隐蔽化和难以被察觉。例如，一些学者以学术名义解读和研究历史，实则别有用心，试图解构党史国史，混淆民众视听；通过一些自媒体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抹黑党史国史；含沙射影，否定党的执政理念，攻击国家制度；等等。

二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范围愈发广泛。借助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路径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伴随着以往的文字、图片等内容，音频、视频等全媒体的内容形式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在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助力下，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和历史观、价值观往往巧用噱头和焦点话题，在网络空间中以极快的信息传播速度和效率进行扩散，传播范围也随之变得更加广泛。如有人将恶搞《黄河大合唱》的行为录制成视频上传至网络，随后迅速获得大量点击，而这背后也潜藏着一些人对历史的无知与虚无化的倾向。

三是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程度愈发深刻。2017年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多起事件不断刺激着民众的神经，如在刘胡兰英勇就义70周年之际，一封《请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点》的家长信在各大知名网络媒体、朋友圈广泛热传，这封信其实早在2014年就出现在网上，却被历史虚无主义者拿来炒作，意图歪曲英雄主义教育。而在关于这些内容的后续评论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虚无化倾向言论，尤其以青年群体的虚无化倾向最为明显，多属盲目跟风，主观臆测教科书中的历史为“伪史”，夹杂着凸显个性与宣扬正义的自我展示心理，让我们不得不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对民众思想和认知侵入的严重性。

借具体舆情事件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同其他思潮形成合流冲击现行制度

梳理2017年发生的多起舆情事件，都可以发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子。历史虚无主义在2017年愈发表现出借时、借势，浑水摸鱼、混淆视听的趋势，表面看是针对具体的舆情事件的价值探讨，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其中暗藏着“虚无”和“否定”历史的“猫腻”。

在建军90周年之际，借助这一重大事件节点，网络中出现大量所谓的解密内容，宣称以“解密”方式还原党史，继而开始歪曲和污蔑党史上的路线分歧。历史虚无主义者企图通过这种“解密”和“还原”历史的方式，丑化和否定我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的合法地位，进而开始全面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种通过否定历史细节继而否定历史整体，最后通过历史假设来推断和否定党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惯用的伎俩。

2017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呈现合流之势，并不断伺机制造社会舆论，或发酵舆情事件，对现行社会制度形成冲击。

历史虚无主义借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形势变化，趁机裹挟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极力渲染和助燃意识形态纷争。历史虚无主义者假借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朝鲜试射核导弹、美国施压朝鲜等问题，以及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对我国对外政策大加批评，质疑当前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同时，解构抗美援朝、中印边界战争的历史和集体记忆，企图否定战争的正义性和历史功绩。与此同时，历史虚无主义夹杂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反思我国的港台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并表现出情绪化和极化趋势，容易激化宗教矛盾，危及民族政策，损害长远发展。另外，历史虚无主义者与右翼在否定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合法性等方面具有共同目标，有合谋借文化艺术形式和国际事件达到政治诉求的动机和策略。

此外，历史虚无主义同新自由主义合谋发声，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鼓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思潮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现“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战略工具。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建立假设，并在假设基础上进行推演来否定历史事实，从而实现消解主流价值体系和否定中国道路选择的合理性。基于此，新自由主义开始大肆推行其自由化思想，同时设立中西社会制度的“对比陷阱”，以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多策并举清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

首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理论批判要不断深入。通过加强内容建设、法治建设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应对布局，强化理论支撑和自信。在内容建设方面主动出击，精心设置议题，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伪命题各个击破。党和政府要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宣传阵地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及时回击历史虚无主义者所制造的各种错误言论，回应民众疑惑，通过主动设置相关正向议题牢牢抓住舆论的引导权。在法治建设方面，通过完善包括历史信息在内的信息传

播法制法规，有效打击和防范历史虚无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和冲击。2017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中，《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以立法形式保护英雄烈士形象，有力回击了当前时期一度出现的丑化英烈的恶劣行为，对于打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嚣张气焰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在制度建设方面，通过不断加强队伍建设，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提供人才支持。

其次，深化党史国史军史理论研究，筑牢思想意识防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不断掀起波澜，不只是因为敌对势力恶意搅局，试图扰乱舆论、混淆视听，还因为民众对党史国史军史等历史的无知和疑惑，这才给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可乘之机，为此，应持续深化党史国史等历史的理论研究，为应对和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过程中应牢固坚守“誉而不增其美，毁而不增其恶”的原则，做到实事求是的呈现和评价历史事实。与此同时，针对重大节日和重要节点，应加强相关议题设置能力，组织权威专家提前研究设计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应对方案，从而有效防止历史虚无主义试图撕裂历史共识、文化共识和社会共识。

再次，加强主流话语体系建设，增强主流价值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严峻挑战，加强主流话语体系建设，增强民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无疑是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有效途径。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对主流

话语体系宣传阐释的理论高度、理论广度、理论厚度、理论温度。通过强化党管媒体原则，增强主流话语体系宣传阐释的理论力度。充分利用好全媒体手段，做到实时跟进，积极回应广大民众关切，引导社会思想舆论。精心组织主流话语体系的新闻宣传，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社会主流价值观，增强民众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感，进而提升主流话语体系在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最后，强化网络空间内容监管，净化网络舆论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针对2017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之势，有必要也有义务强化网络空间的内容监管力度，净化网络空间环境，打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存空间。互联网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发酵和引爆的最佳环境，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峙与纷争时有发生，为预防“颜色革命”，建立长效净网专项行动机制，坚持依法管网，制定网络空间内容底线标准，在风险管控上强干立枝，推进网络空间内容管理的法治化进程势在必行。

新自由主义走“下坡路”了吗

陈 槽

新自由主义是发端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种经济思潮，是建立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一套理论体系。但 1929-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引发了西方国家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两次石油危机，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困局，又导致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经济上反对国家干预，在政治上主张多元化，在文化上强调自由化，在全球范围都有一定影响。

2017 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有所减退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作用下，许多国家通过推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精英与资本结合赚得盆满钵满，而底层民众却被日益边缘化、模糊化和微缩化，经济与社会政治问题不断积累发酵。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放任积累了系统风险，最终泡沫崩溃导致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从而使新自由主义遭受重挫。

新自由主义虽然主要是一种经济理论，但所有的政治自由主义者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拥趸，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也都主张政治自由主义。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新自由主义思潮得以进入中国。当时国内学术界对国外的研究偏重介绍市场经济的正面效果，忽略了市场经济和资本运作的负面效应。在反对专制主义、推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自由主义不断发展，成为了对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非主流思潮之一。

新自由主义对于公有制经济持否定态度，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它还认为“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坚持自由市场能够实现自动均衡。由于存在着对西方的依附性，为满足跨国资本最大可能不受国界限制的跨国自由流动的内在要求，新自由主义也反对民族主义，其政策主张往往脱离中国实际和发展阶段。同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不容许批评西方和美国，自觉不自觉地为美国内外政策辩护。他们以垄断为由反对国企改革，但却不指责外资的垄断。他们宣传国企和私企(民企)之间的矛盾，实际却代表了外资利益。

中国发展势头强劲，国力日益增强，普通民众存在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2017年宣传民族自信和爱国主义的影片《战狼2》，虽然受到了新自由主义者和有买办倾向的资本势力指责，但却赢得了巨大的市场效应。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在没有强烈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它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潜流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部分青年学生之中。

新自由主义在某些外界因素刺激下时隐时现

2016年底，民营企业家曹德旺赴美投资并且发表了一番批评中国税收苛重的言论，由此而引起了中国社会对于政府作用和税收问题的讨论，大量的网上言论显然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2017年末，美国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即将实施3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这对中国社会又是一个强烈的外部刺激，由此而引发了网络上关于政府功能以及对于中国政府作用的大量评论，如政府权力过大等，这些言论大多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范畴。

除此以外，2017年发生的其他一些公共事件，比如北京市政府清理外来人口居住地、政府对于曝光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处理、2017年10月实施新版《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理规范》要求全部拆

除违规广告牌打造城市“天际线”活动，以及华北居民煤改气工程等，也引起人们热议。毋庸讳言，在个别公共事件中，政府的决策和政策实施中存在一些问题，由此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各种思潮都有所表现，从中也不时地可以听到新自由主义的声音，而且可能是各种声音中音量最大的，特别是关于人权方面的指责。

不过，虽然新自由主义一直在发声，但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并且缺乏社会基础，信奉个人价值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可能建立起稳固严密的组织化形态，尤其是其政策方案往往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与民众情感和民族意识疏离，所以很难得到民众持续的跟进和拥护。其在得不到政治高层和国外势力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尚不能构成对于政治秩序的颠覆性威胁。

新自由主义可能构成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有市场崇拜或市场原教旨倾向，相信仅靠市场机制就可以决定经济的有效运行，这在理论上是天真的，在实践上也是危险的。

加剧社会分化。新自由主义主张过度私有化和市场机制、减少国家监管和干预，尽量减少公共福利，实行自由经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政府势必无法对资源进行调控，从而导致资本力量大行其道。资源被迅速积聚于强势集团手中，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缺乏和低质量，加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社会下层被彻底边缘化，大量的失业和贫困现象难以避免。医疗、教育市场化加重人民负担，住房市场化催生金融泡沫。由此，导致社会分化和社会裂痕日益明显化。

增大金融风险。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必然导致债务膨胀、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频现。实施新自由主义，必然在各经济体内部使财富与收入分配差异显著拉大，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在国际间使消费型发达国家与生产型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变得不可持续，而使经济危机频发。

发展中国家经济上丧失主权地位而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虽然新自由主义以纯经济面目出现，但西方国家常利用其引诱或压迫发展中国家按照国际惯例实施改革，要求以西式民主政治保障市场经济，从而把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新自由主义因此成了西方国家推行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被拆除主权壁垒保护而完全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必然在经济上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在政治上导致参与过度而失序。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势必大幅度降低公共参与的门槛，使发展中国家公共参与爆棚而导致政治混乱。新自由主义虽然主要是一种经济理论，但在政治上也主张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大众权利意识骤然觉醒但参与能力却相对低下、社会各利益团体尚未达成利益分化后的妥协共识、国家的政治参与机制很不健全、政治包容度不高的环境中，大众公共参与爆棚而相应的政治系统无法承受巨量参与信息的输入，从而导致政治系统崩溃。

应对新自由主义思潮，需要我们坚定“四个自信”。要进行公开正常的讨论，把学术理论中的新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中的新自由主义进行区分，指明新自由主义的学术立场问题与观察缺失。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互配合。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坚持主体地位，在开放中不断发展。要构建良性正常可持续的政府与民众互动模式，使民众利益诉求能够全面准确地通达至决策层面。同时在决策和施政方面增加透明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的逻辑谬误

范逢春

党的十九大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方案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2017 年，长期活跃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虽然有所式微，但是并不甘心失败，仍然借机制造负面舆论，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宣扬其国家治理方案。虽然新自由主义的狭隘性、阶级性和虚伪性不断暴露，但是因其高度的理论欺骗性仍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如何从全球视野来反思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仍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的理论批判

当前，新自由主义在国内传播重点从经济治理问题转移到了国家治理问题上来了。2017 年，新自由主义者利用网络制造一些负面舆论，认为“党领导一切”就是“一党专政”，就是“专制政治”；提出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国进民退”，最终一定会失败；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贴上“非民主”的标签。相比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构造了更为精巧的理论。在国家起源问题上，针对“古典契约论”提出了“新契约论”和“反契约论”；在国家制度建构上极力主张西方式“多党政治”与“宪政民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鼓吹“极端个人主义”与“极端的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宣称其国家治理方案具有普适性、终结性与优越性，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一，新自由主义宣称其国家治理方案具有“普适性”。2017 年，新自由主义者仍然坚持“美国方案最优论”，具有“普适性”。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一直到 21 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一

直占据主要指导地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治理变革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新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方部分国家的历史经验，本身只是西方历史长河中某一阶段的产物，但是新自由主义却专断地声称其是对全人类历史都有效的理论解释。新自由主义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解决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打上了西方社会的深深印记，但却宣称自己获得了关于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新自由主义否认人类社会的多元性与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永恒化，将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神圣化，对不同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国家治理模式缺乏应有的包容与尊重。

第二，新自由主义宣称其国家治理方案没有“阶级性”。虽然新自由主义宣称自己哺育出的国家治理方案是以“价值中立”为基础，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事实基础，是炮制出来的不折不扣的谎言。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政治本体论批判，我们可以发现其背后的“资本逻辑”。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就是通过极端“市场化”和彻底“私有化”将人类公共资源转化为大资本所有。其中，资产阶级国家“不但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安排，而且将其获取的资本私有化，并使之成为资本积累最初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绝不仅仅是一般学术理论，它从诞生开始就沦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意识形态，深刻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攫取自身利益的要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第三，新自由主义宣称其国家治理方案最具“有效性”。新自由主义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主张完全的市场化、绝对的自由化和彻底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提出，一切计划都是对自己“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种幻觉”，是“致命的自负”，都是低效率的，都注定要失败。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却选择性地忽视了“市场失灵”等问题，也并未在“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找到

灵丹妙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既需要“看不见的手”激发活力，也需要“看得见的手”构建秩序，这已是经理论与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

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的谬误之处

2017年，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之所以在国内一些人的理论思考中成为所谓的“主流话语”，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有意识地输出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由于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的逻辑建构很容易迷惑人。要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谬误，必须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进路错误。

“个人主义”的逻辑起点错误。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以抽象化和理想化的“个人主义”作为逻辑起点，以此来推演社会秩序的变化。新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把“个人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认为任何选择都是由纯粹的“具体个人”做出的，“社会集体”这些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以个人价值为价值主体，以个人理性为价值工具，以个人利益为价值标准，这导致了新自由主义逻辑起点的错误。然而，“人类从来就不曾有过先于社会而存在的时期”。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个人”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沦为“一种无社会理论的政治理论”，也就是必然了。

“市场万能”的逻辑观点错误。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市场化”，主张政府不管最好。新自由主义从两个方面来极力“贬抑政府”。一方面，塑造“市场神话”，强调私有企业利益至上，强调市场竞争的无比高效，反对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宣扬“公民社会”是一块净土，只有公民社会才会保护公民权利；国家总是在侵犯公民权利，国家是个人自由的敌人，否定国家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功能。按照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逻辑，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然而，权利与秩序之间的

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国家对秩序的维护，市场与社会是不能良好运行的。

“历史终结”的逻辑结论错误。新自由主义意图通过输出意识形态把非西方国家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来，推动“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个角落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国道路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展示了非凡的魅力，焕发出无限的生命力。新自由主义代表性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教授也不得不感叹，“中国模式代表高效与集中。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结。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自身错误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不但在其西方大本营遭到失败，同时也给其他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是其用来推行国家霸权主义的政策工具。它既不是普遍必然的历史模式，也不包含终极的永恒真理。中国道路不断打破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的迷思，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进一步宣判了新自由主义“理想国”的覆灭。

看清“普世价值”的伪善本质

项久雨

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然而，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恐慌，“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中国崩溃论”等不绝于耳，一些西方国家企图通过意识形态输出，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普世价值”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清醒认识“普世价值”的虚假面貌、揭穿其真实意图、破除思想上的迷障、增强战略定力，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前提和重要任务。

2017年普世价值论的表现与特征

近年来，西方国家大力推行的“普世价值”在我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国内主流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虽然“普世价值”在我国已经遭遇了诸多抵制，但其仍未销声匿迹。2017年，普世价值论通过乔装打扮，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

第一，意识形态企图依然明显，越发暴露出“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普世价值”包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企图。当前，“普世价值”已经由生活话语、学术话语逐步转变为政治话语。“普世价值”的拥护者打着淡化意识形态的幌子，在意识形态领域动摇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报刊影视、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以及扶持“西化精英”等手段，企图以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改造中国。西方竭力推行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双重标准掩盖下的霸权行径：一方面利用“普世价值”到处标榜民

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使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

第二，混淆概念本质，掩藏“普世价值”的迷惑性。一是将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混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世界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以及治理赤字三大难题，人类急需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凝聚共识、寻找共同的价值遵从，这给“普世价值”从“全球伦理”角度包装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混淆。当前，一些人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字面上的部分重合，宣称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西方的“普世价值”，企图以“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故意混淆概念、掩盖价值本质的做法是居心叵测的。通过模糊判定标准来制造思想上的错乱认知，是“普世价值”因站不住脚而采取的迷惑手法。

第三，文化渗透，体现“普世价值”推行的隐蔽性。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普世价值”时也进行了战略手段的调整。

“普世价值”是当前一些西方国家传播和推销文化霸权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加注重运用文化战略实现国家利益。一些西方国家以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价值观偏见看待中国社会，扮演貌似公允的批评者角色，对中国文化自信形成冲击与挑战。而网络的发展，也为一些西方国家进行价值渗透提供了便利的工具。普世价值论者通过网络营销、“水军”灌水、编制谣言等方式煽动民众情绪，攻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并且瞄准青年群体，借助网络等平台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一些青年逐渐丧失理想与信念。

普世价值论的真实意图

不论普世价值论如何变换手法、翻新花样，都无法掩盖其真实意图，即通过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实际上，“普世价值”之争，就是“制度”之争、“主义”之争。

首先，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体现，代表和维护着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西方国家借助资本进入、文化输出，甚至动用武力推行“普世价值”，除了为其从世界上攫取更多利益提供“正当理由”和“舆论支持”外，更多的是否定一些国家的价值观，瓦解一些国家人民的价值追求。近些年来，我国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同时，随着中国声音、中国理念、中国产品逐渐“走出去”，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上升，这使得一些西方国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他们大肆向中国渗透“普世价值”，妄图摧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瓦解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

其次，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和保障自由、平等、公正以及人权等，所以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新中国在经过近 70 年的发展完善后，形成了系统的、完备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逐渐彰显出优越性。中国的发展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满与嫉妒，他们图谋打击、消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向中国渗透“普世价值”正是其图谋的重要表现。通过渗透“普世价值”，企图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取代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用“多党制”“三权分立”取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而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最后，否定社会主义。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眼中，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也是最好的“主义”，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与根本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因此，为了防止威胁的产生，他们决不允许社会主义的存在。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正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渗透“普世价值”，就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阻碍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手段。

事实上，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是虚无的。普世价值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怎样的价值观。而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普世的、超阶级的、超时空的价值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普世价值”，既要加强理论分析与批判，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更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价值观自信，凝聚广泛价值共识。

（《人民论坛》2018年02期下）